



# “传统”的异化： 伪满洲国时宪书时间秩序的构造<sup>\*</sup>

**内容提要** 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就制定了时宪书,试图通过这种影响广泛的文本塑造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伪满洲国的时宪书也具有自身的特点:既试图接续清代以来历书制作的传统,又不得不顺应民国之后改用阳历的大势,同时将日本的殖民同化构想注入其中,构筑“日满一体”的时间秩序。这种“化民成俗”以实现“王道政治”的取向,使得伪满洲国时宪书的内容变得极其混杂,新历与旧历并存,带有迷信色彩的宜忌注解与现代科学知识共容,但此种繁复混杂的内容恰恰是历书制作传统异化的结果。

**关键词** 伪满洲国 时宪书 时间政治

历书作为人们对物理时间现象社会化的成果,既表现了人们对自然界时间现象的认识,又负载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信仰、习俗以及对社会时间秩序的安排,因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官定历书还带有当政者对社会时间控制的意图,构成了社会时间秩序的重要部分,因此历书的制作与颁行受到当政者的高度重视。1932年,日本扶持下的伪满洲国成立,为了塑造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伪满洲国随即制作了独具“特色”的时宪书。<sup>①</sup>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梳理伪满洲国时宪书的编订取向、内容体系及其变化,探析伪满洲国社会时间体系的构建与影响,以期明晰日本控制之下的伪满洲国如何通过接续和改造清代以来历书制作的“传统”,从而构建“日满一体”的时间秩序。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官定历书研究”(15CZS038)的阶段性成果。

① 对伪满洲国时宪书的研究,日本学者丸田孝志从象征符号与民俗传统的角度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着重分析了日本对伪满洲国时宪书编订与颁行的影响,参见丸田孝志「滿州國『時憲書』と通書——伝統・民俗・象徴の再編と変容」、『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第14号、2013年3月、1—28頁。韩国学者郑盛熙(郑盛熙)梳理了伪满洲国时宪书演变的历程及其政治意义,参见郑盛熙,2008,「滿洲國(1932—1945)의時宪書暨과 그 정치적 의미」,『동북아역사논』22,339—372。而国内对伪满洲国时宪书的研究主要侧重批判其作为日本侵略中国工具的作用,相关述评及研究可参见刘景岩《旧东北气象设施录实》,通化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东边道经济开发史略》,通化师范学院印刷厂1998年印刷,第63—85页;丁立身编著:《伪满十四年血腥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277页;智利疆:《伪满洲国的“国家祭祀”及其日本化》,《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方艳华:《试论伪满祀孔典礼的堕落与变异——兼论“王道政治”的历史命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等等。不过,处于近代社会转型背景之下的伪满洲国时宪书,其自身演变与近代知识转型的关联与矛盾,以及标准化时间的扩展对其影响等内容,仍有研究的空间。

## 一、时宪书的制作与印行

1932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的授意之下宣布成立伪满洲国。时宪书作为构建“国家”象征体系和时间秩序的重要工具,受到了日“满”的高度重视。1932年4月,伪满洲国即与日本相关方面召开会议,筹划设立编订历书的机构和历书的内容体例,随后实业部成立了《大同二年时宪书》编纂委员会,顾问有罗振玉、藤原唉平、关口鲤吉、佐藤了翁、草间茂登、张燕卿。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是松岛鉴,委员包括王圻俊、王嵩儒、横瀬花兄七和胡靖。同年,大同元年(1932)和大同二年(1933)时宪书由伪满洲国国务院颁行。<sup>①</sup>由于时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的郑孝胥极力主张历书编订要注重民众的需求,以便普及历书,因此《大同二年时宪书》保留了大量清代时宪书的内容,其中历注的宜忌注释完全按照清代《钦定协纪辨方书》的“御用六十七事”加以规定。<sup>②</sup>1933年9月,伪满洲国实业部成立《满洲国大同三年时宪书》编纂委员会,顾问为罗振玉、佐藤了翁、张燕卿、关口鲤吉和松岛鉴,由伪满洲国中央观象台台长后藤一郎担任委员长,成员包括王圻俊、王嵩儒、胡靖、土佐林忠夫。《满洲国大同三年时宪书》虽然是以时宪书编纂委员会的名义编纂的,但实际是在日本中央气象台关口鲤吉技师的指导下,由该台中野猿人和神田清在东京完成历日的推算,由佐藤了翁完成时宪书的注释,最终通过伪满洲国国务院出版发行。《满洲国大同三年时宪书》历算部分的日出入时刻表由北京附近为标准改为以新京(长春)附近为标准进行推算,为了增加时宪书对民众的亲近感,时宪书的印刷字体全部由宋体改为楷体,历注部分删除了“不宜”的内容,并修改了“宜”的内容。可以说,佐藤了翁在保留大同二年时宪书历注形式的同时,对历注内容进行了重大改造。经过改良的《满洲国大同三年时宪书》也成为此后伪满洲国时宪书编订的范例。<sup>③</sup>由于时宪书编纂委员会为临时性的编历机构,其成员多为兼职且无专业的测算部门,因此成立专门的编历机构势在必行。1933年11月1日,伪满洲国中央观象台成立,取代时宪书编纂委员会承担编订时宪书的职责,隶属于实业部管理。<sup>④</sup>不过,“中央观象台”建立初期,由于缺乏专业人员,加之候任台长的后藤一郎尚未到任,时宪书编订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1934年2月,在编订康德二年(1935)时宪书时,为慎重起见,推算任务仍由神田清、矢崎敬等人在东京完成。同年六七月间,经日“满”双方协商,出版了《康德二年时宪书》。1934年9月,“中央观象台”内部分科制度公布,其中时宪书的编订任务由天文科承担。<sup>⑤</sup>10月,后藤一郎因车祸身亡,随后神田清出任天文科科长。自此之后,伪满洲国的时宪书编制工作才步入了“正轨”。<sup>⑥</sup>“中央观象台”完全由日本人掌控,主要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的军事活动提供服务,决定了伪满洲国中央观象台制定的时宪书也必须服从日本战略利益的需要。<sup>⑦</sup>

<sup>①</sup> 《满洲国大同元年时宪书》是由伪满洲国实业部非专业人员编制出版的,后来发现其中许多历注条目中含有反满抗日思想内容,因此伪满洲国民政部、实业部等不得不于1933年2月先后发布公告将之禁止使用。相关情况可参见刘景岩《旧东北气象设施录实》,《东边道经济开发史略》,第80页;由测重雄《旧满洲国中央观象台史》、秀研社印刷株式会社、1988年,7页。

<sup>②</sup> “满洲国实业部”编纂:《大同二年时宪书》,“满洲国国务院”大同元年(1932)颁行。

<sup>③</sup> 神田清「满洲国时宪书の制定と其普及」、大政翼赞会興亞局編『曆法調査資料』第8輯、大政翼赞会興亞局、1942年、4頁。

<sup>④</sup> 《中央观象台官制》,《满洲国政府公报》第252号,大同二年十一月一日(1933年11月1日),第2页。

<sup>⑤</sup> 《中央观象台分科规程》,《满洲国政府公报》第158号,康德元年九月八日(1934年9月8日),第5—6页。

<sup>⑥</sup> 刘景岩:《旧东北气象设施录实》,《东边道经济开发史略》,第80页。

<sup>⑦</sup> 伪满洲国中央观象台从设立到覆灭,共六易台长,均由日本人担任。第一任后藤一郎,从1933年11月1日至1934年10月9日。第二任高桥康顺(原伪满实业部总务司长)兼任,从1934年11月15日至1936年9月13日。第三任谷本城(原冲绳地方气象台长),从1936年9月14日至1940年4月1日。第四任长谷川谦(原日本学习院教授),从1940年4月2日至1943年12月17日。第五任和达清夫(原日本中央气象台技师),从1943年12月18日至1945年7月10日。第六任大谷东平(原日本中央气象台业务部长),从1945年7月11日至同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相关情况可参见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吉林省志卷三十五·气象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伪满洲国时宪书编订采取了“新历旧历并存”的取向。“时宪书”一名,是清代官定历书的别称。1644年,为了迎接福临继位,清王朝依据汤若望等人编订的《西洋新法历书》改制为《时宪历》,后为避清高宗弘历之名讳,改为《时宪书》。民国建立之后,官定历书一律更名为“历书”,而伪满洲国仍取“时宪书”之名,乃试图从形式上接续清王朝历书制作的“正统”,为伪满洲国寻求存在的“合理性”,所以1932年10月罗振玉受伪满洲国实业部部长张燕卿嘱托为《大同二年时宪书》作序时就说:“此书之称《时宪书》,遵祖制也。”<sup>①</sup>另一方面,伪满洲国时宪书采用阳历,顺应了清末以来的改历趋势。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使用阳历。自此之后,来自西方的阳历就成为政府主要使用的历法。北洋政府时期,为了适应民众的需求,采用阴历与阳历并存的方式,成为官定历书制作的特点之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查禁旧历,大力推行阳历。不过由于民俗习惯的深远影响,旧式历书在民间深受欢迎,而新编之官定历书的使用范围和影响极为有限,由此形成历书的官民分野与新旧对立,成为当政者强化自身政治权威的障碍。<sup>②</sup>吸取民国前期新历推广不力的教训,伪满洲国时宪书编订采取新历旧历并存的方式,通过保留大量前清时宪书的内容,试图迎合民众习于旧俗的现实,期望能迅速得到民众的认可。对此,《满洲国大同三年时宪书》的“凡例”就说:“日用虽以太阳历为准,但均附注太阴历,以资参考。”<sup>③</sup>此外,伪满洲国还宣称,时宪书“以阳历授时”还有“政尚大同”的用意。<sup>④</sup>这是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已经逐步采用了阳历,改用阳历与日本“保持一致”,有利于构建“日满一体”的时间秩序,便于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控制和管理。由此可见,伪满洲国时宪书新历旧历并用,既有迎合“日满一体”时间秩序的现实需要,也有承继清代时宪书的形式以塑造伪满洲国存在“合理性”之企图。

伪满洲国时宪书的制作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供给伪满皇室及政府各机关内部使用的“内府本”,其中有用于伪满洲国高官及观象事业相关人士赠送的黄表纸时宪书,大约每年发行约300至800册,还有伪满洲国政府各官厅使用的红表纸时宪书,大约每年发行20000至60000册。此类时宪书最初由伪满洲国实业部编纂,后由“中央观象台”编纂,均由伪满洲国国务院颁行,印量较小,但制作精美印刷质量较高,其中的伪满洲国地图、伪满洲国国旗等内容均为彩色印制。另一种时宪书是面向伪满洲国普通民众发行的民历,由伪满洲国通信社发行,印制的纸张质量较差,其中仅仅添加有红色套印的“满洲国帝国全图”。<sup>⑤</sup>受制于近代中国军阀割据及历书改制的影响,北洋政府时期的官定历书每年发行数量大约为18万册,就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历书的推行效果也并不理想。但在1932年至1945年间,伪满洲国时宪书连续出版发行,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效。据神田清记载:伪满洲国“民历”1933年印制约为10万册,1934年30万册,1937年达到80万册,1943年超过100万册。丸田孝志据此推测,1943年伪满洲国平均5户人家即有一本时宪书。<sup>⑥</sup>伪满洲国在民间推广时宪书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对历书发行实行许可出版管理,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历书的出版,为官定历书的发行奠定了基础。<sup>⑦</sup>其次,伪满洲国时宪书十分注重内容的稳定性和实用性,编订者甚至对时宪书的字体及其

① 罗振玉:《时宪书序》,《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四),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687页。

② 朱文哲:《旧俗、新知与政治:辛壬之际官定历书的改制与编定》,《民俗研究》2015年第6期。

③ “满洲国实业部”编纂:《满洲国大同三年时宪书》,“满洲国国务院”大同三年(1934)颁行,第6页。

④ 《满洲国假节日》,“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康德二年(1935)编印,第2页。

⑤ 神田清「满洲國時憲書の制定と其普及」、「暦法調査資料」第8輯、5頁。

⑥ 丸田孝志「满洲国『時憲書』と通書-伝統・民俗・象徴の再編と変容」、「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第14号、2013年3月、3頁。

⑦ 「暦二閏スル雑件7. 满洲国暦関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1383800,暦二閏スル雑件(I-1-3-0-5)(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大小、图示所放置的位置都有精心安排,加之时宪书所附录的各种实用性知识,使之满足了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sup>①</sup> 最后,伪满洲国通过“中央观象台”制定统一的时宪书,由伪满洲国通信社统一发行,保证了时宪书在民间的普及。从发行时间来看,内府本时宪书印行日期都标注为当年的1月1日,但民历的发行时间一般在前一年的8月至10月份左右。这是因为内府本时宪书主要是由政府自上而下进行配给,而民历则是按照民众的需求进行发售,提早印制发行便于民众的购买和使用。正是由于伪满当局对时宪书制作和发行的高度重视,并构建了较为高效的发行网络,伪满洲国时宪书的推行取得了突出成效。

## 二、时宪书的内容构成及其意涵

伪满洲国时宪书承袭了清代以来历书制作的传统<sup>②</sup>,不过由于受制于日本构筑“日满一体”时间秩序的取向,尽管其内容的增减与时势变化密切相关,但大体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体例。其内容主要由三方面构成:时间表达体系、社会政治事项和民间信仰习俗。

首先,历书最基本的功能是时间表达,这既是当政者构筑时间秩序的基本依据,也是民众社会生活展开的重要参照。在伪满洲国时宪书的构成中,年月日时的表达方式,在传达最基本的物理时间计量的同时,也构筑了独特的社会时间秩序。

从纪年的标注形式来看,大同、康德年号构成了伪满洲国时宪书最突出和最独特的标识。清代时宪书的封面名称一般是“大清”加上皇帝年号,如《大清光绪四年时宪书》。民国建立之后,除袁世凯为称帝需要制定的《洪宪元年历书》外,官定历书都抛弃了皇帝年号纪年的方式,如《中华民国二年历书》。不过伪满洲国时宪书的纪年方式则稍显复杂:1934年的《满洲国大同三年时宪书》封面上带有“满洲国”的国号,但同年制作的《康德元年时宪书》封面则去掉了“满洲国”字样,在扉页上仍会标注“满洲帝国”,如“满洲帝国康德元年岁次甲戌时宪书”,而伪满洲国通信社针对普通民众发行的“民历”封面及扉页上都没有“满洲帝国”的字样,只有溥仪的年号。这也成为此后伪满洲国时宪书的基本格式。但不管是日本关东军所定的“大同”年号,还是溥仪自定的“康德”年号,都蕴含了施行“王道政治”的含义。<sup>③</sup> 另外,伪满洲国时宪书的扉页在标注溥仪年号的同时,又在年号纪年之后用小号字体标注干支纪年,与清代时宪书内页上的纪年形式一致,凸显了伪满洲国时宪书对清王朝正统的继承。但总体来看,伪满洲国时宪书的纪年表达突出了溥仪年号,并不愿意凸显伪满“国号”。

月份分割的区别是新旧历法的最大差异,也是自民初以来历法改革最具有争议的地方。<sup>④</sup> 由于中国传统历法为阴阳合历,兼顾了月亮绕地球运动周期和地球绕太阳的运动周期,与单纯参照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的阳历完全不同,两者的差异主要是通过月份分割来体现的。而伪满洲国时宪书新历与旧历共存,有关于月份的内容极为混杂。对于月份时间的表达,由于阴历与阳历日期不一致,前后相差约一个月,所以阳历与阴历采用的是分栏标注,如《康德四年时宪书》第6页内容自上而下分别是:阳历月表、阴历月表、节气表,其中阴历月表从丙子年十二月列至丁丑年十二月(共13

① 土佐原忠夫「曆書の編纂と其の頒布に就て」、『曆法調査資料』第8輯、13—14頁。

② 缪之晋曾以“天之道、地道、时之道和人之道”阐释了时宪书内容构成的独特意义:“历中首详各省节气时刻及昼夜长短诸例,天之道也;次列八卦方位、二十四山、九宫紫白诸局,地之道也;中列十二月七十二候等类,时之道也;内复备人事之趋避吉凶之向背,人之道也。”参见缪之晋《大清时宪书笺释》,《续修四库全书》第10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1页。

③ 彭超:《伪满洲国年号、国旗、国花考辨》,《溥仪研究》2015年第1期。

④ 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个月),这样是为了与阳历月表能够对应。其中阴历月表的内容更为丰富,在月份之下会标注月大月小、月建和朔日干支。<sup>①</sup>而在节气表中,每个节气下会特别注明“阴某月节”,在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入节的时刻表中,则会用阴历和阳历同时标注。每月日历表起始的右侧位置专门用来说月份的相关情况:一般是阳历在上,内容包括月份大小及月份表,在此之下则是阴历月份的内容:阴历月建大小、当月所值月宿、流年紫白吉凶方位、节气时刻表、朔望两弦时刻表等。尽管伪满洲国时宪书中阴历月份的内容更为丰富,但是其历法体系的构建以阳历为主,阴历附于阳历之下,遵从了阴阳历并存的编纂原则。

日历表是历书最重要的部分。从伪满洲国时宪书日历表的内容来看,由于伪满洲国时宪书以阳历作为标准,同时又附注了阴历,因此整个日历表的内容新旧混杂。以《大同二年时宪书》为例,其历日编排也是阳历与阴历并存,从上至下的内容分别是:阳历日序、七曜日、表示吉祥的月神类、日神类和时神类的善神内容、阴历日序、干支五行二十八星宿建除十二神、表示凶险的月神类、日神类和时神类的煞神内容、宜忌注解。自清末民初历法改制以来,时人围绕着历日编排到底以阳历为主还是以阴历为主,产生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官定历书编订完全删除旧式历书中的神煞吉凶、宜忌注解,历法编订则主要采用新历旧历并存、阴阳并用的方式。而伪满洲国时宪书保留了大量传统历书的神煞宜忌内容,与民初以来的历书编制特点迥然不同。如《大同二年时宪书》几乎完整保留了清时宪书中的各种神煞宜忌内容。《满洲国大同三年时宪书》的历注删除了“不宜”的内容,但在阳历之下又加上了十二道神煞的名号。随后《康德二年时宪书》就将阳历日历表之下的神煞名号移至阴历日历表下,而《康德四年时宪书》则将之删除。在阳历日期表中,又用图示标注出了上弦、下弦、合朔、望日,同时又标注了“土王用事”、伏日社日,历目的历注部分仍保留了“宜”的内容。另外,自民国建立以来,官定历书就用七曜日表示星期,使来自西方的星期制日渐普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安排的重要参照。<sup>②</sup> 伪满洲国时宪书也添加了相关内容:最初只有七曜日表,从1939年《康德五年时宪书》开始,在日曜表的上方添加了星期表。到了1945年,《康德十二年时宪书》的日历表仅仅保留阳历日序、星期表、七曜日、阴历日序、干支五行二十八星宿建除十二神、含有“宜”的历注,而其他的神煞吉凶和禁忌的内容都被删除了。总体而言,日历表呈现出由繁至简的变化趋势。

伪满洲国时宪书的时刻表,成为强化“日满一体”及伪满洲国地理疆界的重要工具。自1932年起,伪满洲国时宪书在“凡例”中就有对“时刻”的说明,此后有关时刻的说明不断细化,1935年的《康德二年时宪书》的凡例中有七条内容,其中四条是有关“时刻”的说明:“凡时刻用我国标准时,即东经一百二十度之平时”,“日出入时刻以日面上边见于地平线上之时刻为准”,“月出入时刻以月面中心见于地平线上之时刻为准”,“每月节气下所载日出入时刻以新京为准”。<sup>③</sup> 这些时刻表既有清代时宪书的遗留,也有构筑“日满一体”的现实需求,更蕴含着宣示伪满洲国疆界的功能。以各地之日出入时刻及方位表为例,这一内容在清代时宪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尽管对普通百姓而言并无多大用处,但对于宣示帝国统治疆界的意义则十分明显。<sup>④</sup> 此种意义对伪满洲国也同样适

① “满洲国中央观象台”编纂:《康德四年时宪书》,“满洲国国务院”康德四年(1937)颁行,第6页。

② 湛晓白:《从礼拜到星期:日常休闲、民族主义与现代性》,《史林》2017年第2期。

③ “满洲国中央观象台”编纂:《康德二年时宪书》,“满洲国国务院”康德二年(1935)颁行,第3页。

④ 自康熙时期至嘉庆时期,随着清王朝统治区域的扩展,钦天监的工作范围也随之扩展,而各区域的太阳昼夜出入及节气时刻都先后增入时宪书,以表明清廷统治之状况。如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平定准格尔叛乱,乾隆下旨:“准格尔部尽入版图,其太阳出入、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1140卷,“钦天监”,光绪二十五年(1897)石印本。

用,时宪书详细列出伪满洲国各地区日出入时刻及方位,同时详细注明了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月出入时刻表,从形式上强调了伪满洲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除此之外,随着现代计时体系的发展和标准时制的普及,这些时刻的规定使得伪满洲国的标准时最终与日本的标准时实现统一,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因此受到时宪书编订者的高度重视。1932年4月1日,伪满洲国国务院发布院令,要求“行政办公时间必须划一”,决定以新京时刻为标准时间<sup>①</sup>,实际使用东经120度标准时。1934年,时任“中央观象台”台长的后藤一郎就将构建日“满”统一时刻视为“中央观象台”的重要任务之一。<sup>②</sup> 1936年8月,伪满洲国发布规定,从1937年1月1日起,使用东经135度标准时,《康德四年时宪书》“使用新定之标准时,即东经一百三十五度之平时”。<sup>③</sup> 这一改变使得伪满洲国与日本在标准时间上保持一致,由此使得伪满洲国完全被纳入日本的“时间秩序”之中。

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年月日时的时间表述体系之外,伪满洲国时宪书还有《星期日表》《庆祝日》《官署放假日期表》等等,共同构筑了新的时间秩序。此外,伪满洲国时宪书还有各地平均气温表、降水日数、快晴日数、霜雪期节。这些内容对于民众了解伪满洲国的气候状况有一定帮助,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了参考。

其次,伪满洲国时宪书还扮演着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奴化东北民众的工具。因此,伪满洲国时宪书随时势变动,贯彻日本的“意志”就成为自身重要的定位。实际上,日本的政治控制贯穿于伪满洲国时宪书的各个方面。下面主要着眼于分析伪满洲国时宪书如何构建了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之政治象征符号与政治宣教内容体系。

政治象征符号是构筑现代国家极为重要的内容。如何塑造出伪满洲国作为“国家”的“特性”,并将之改造成为日本控制的工具,成为伪满洲国政治象征符号体系构建的重点,也是伪满洲国时宪书要充分展现的内容。由于时宪书所能容纳的内容有限,因此只能精选最重要的象征符号,其中包括溥仪像、伪满洲国的地图、国旗、国歌等。伪满洲国的国旗和地图前后总体变化不大,是时宪书中最稳定的内容。对于时宪书中添加国旗,伪满当局认为:“国旗为国家之代表,欲使国民对自国有深切之认识,则涵养国民尊重国旗之观念,诚为有效之图。”<sup>④</sup>其他国家象征符号的作用也大体如此,都受到了伪满洲国的高度重视。1933年2月24日,伪满洲国国务院发布第四号布告,公布了正式的“国歌”<sup>⑤</sup>,《康德二年时宪书》添加了伪满洲国国歌歌词及五线曲谱。1942年,伪满洲国又制定了新国歌,并将此前的国歌改称“建国歌”,随后制定的《康德十年时宪书》添加了伪满洲国新国歌。对比伪满洲国国歌内容前后的变化,可以看出此前的伪满洲国国歌更加强调其作为一个“国家”的意义,而新国歌则极力强调天照大神对伪满洲国的眷佑及其重要性。<sup>⑥</sup> 但伴随日本强化对伪满洲国控制的同时,时宪书原有强化溥仪权威的取向有所弱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溥仪的照片从宪书中消失。从1932年至1938年,伪满洲国时宪书内页第1页都印制了溥仪的照片,但1939年之后的时宪书则取消了溥仪的照片;二是将“执政万寿”改为“皇帝万寿节”,再改为“万寿节”。

① 《院令第四号》,《满洲国政府公报》第二号,大同元年四月十五日(1932年4月15日),第7页。

② 「满洲观象事業に就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10342100、满洲国其他に関するパンフレット級  
满洲国大系各輯等住谷悌史資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③ 《康德四年时宪书》,第3页。

④ 《(各省纪事)吉林省公署教育厅公函:关于奖励国旗揭扬之件》,《文教月报》第13号,1936年8月,第22页。

⑤ 《满洲国政府公报》号外,大同二年三月一日(1933年3月1日),第9页。

⑥ 弘报处长(武藤富男):《国歌謹解》,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教育史料》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4页。

构建“日满一体”的内容体系,宣示日本的殖民同化构想,也成为面向普通民众的时宪书之“重任”。自伪满洲国时宪书编订开始,都印有《满洲国建国宣言》。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的支持下成为傀儡皇帝,《康德元年时宪书》即增加了溥仪的《即位诏书》。1935年4月溥仪首次访日,5月2日伪满洲国以溥仪的名义发布《回銮训民诏书》,其中充斥着对日本“仗义尽力”帮助建国的感激。这一诏书从1936年起成为伪满洲国时宪书的固定内容。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并发布了《国本奠定诏书》,其中说:“朕兹为敬立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蒸蒸日跻隆治,仰厥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sup>①</sup>这一内容随即被添加到1941年出版的《康德八年时宪书》中。《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本奠定诏书》的颁布都是着重强调伪满洲国与日本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日本的“帮助”对伪满洲国“国本奠定”的重要性。抗战后期,日本强化了对伪满洲国的控制,时宪书处处都呈现出这一特点。如《康德十年时宪书》的页脚都有关于日“满”合作、鼓吹战争的口号宣传,其中在第4、13、27、40、48页的页脚处印制了“日满一德一心”的字样,以此强化民众对日“满”认同的企图昭然若揭。《康德十二年时宪书》还在第3页增加了“国民训”和“满洲帝国协和会”简介。其中“国民训”总计五条内容,意即伪满洲国国民须遵守的内容,如第一条就说:“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第五条则说:“国民须举总力,实现建国立项,迈进于大东亚共荣圈之达成。”<sup>②</sup>而“满洲帝国协和会”作为伪满洲国动员民众的组织机构,时宪书通过介绍其纲领、组织系统和工作,意在动员民众支持和参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这些内容无疑都是日本强化对伪满洲国控制的重要表现。

最后,伪满洲国时宪书的另一突出特点,就是保留了大量清代时宪书的民俗内容。在清代时宪书中,春牛芒神图、年神方位图、嫁娶周堂图及历日下的宜忌注解等等,是与当时人们认知水平及民俗习惯相匹配的内容。伪满洲国时宪书将之保留,构成了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其中,春牛芒神图是人们用来预测一年旱涝收成的图案,在清代时宪书的制作与颁行中都有着严格的规定。<sup>③</sup>尽管围绕春牛芒神图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但这一图案本身并不具有科学性,也无法为农业生产提供指导。1935年之前的时宪书都添加有春牛图并配有文字说明,之后则改用文字对“春牛芒神式”进行说明。年神方位图是用来推算年神方位宜忌的图形,尽管用以指示日出方位的功能是科学的,但在历书中主要用于预测吉凶兴衰等,因此带有极为强烈的迷信色彩<sup>④</sup>,为了配合年神方位图的使用,在其右侧还会说明太岁及岁德的情况。除此之外,伪满洲国时宪书还添加有供嫁娶择吉专用的嫁娶周堂图,并附录了婚配择吉的男女九宫度生属表。而日历表中添加的“土王用事”“社日”也带有禁忌和祭祀的内容,其中以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前18日为土王用事日<sup>⑤</sup>,即在这些时间内都禁止动土,否则会带来天灾人祸;社日则是古代民众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分为春社和秋社,时间在立春和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这些时间禁忌构成了伪满洲国时宪书极为怪异的一面:在科学已经昌明的20世纪,吉凶神煞、占卜休咎仍然是当政者推行的内容。实际上,伪满洲国之所以利用这些旧的风俗习惯、信仰习俗,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一方面,中华民国

① 《国本奠定诏书》,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教育史料》第1辑,第6—7页。

② “满洲国中央观象台”编纂:《康德十二年时宪书》,“满洲国通信社”康德十一年(1944)发行,第3页。

③ 李松龄:《清宫〈春牛芒神图〉》,《文史知识》1991年第4期。

④ 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⑤ 土王用事日“忌营建宫室、修宫室、缮城郭、筑堤防、兴造动土、修仓库、修置产室、开渠穿井、安碓硙、补垣、修饰垣墙、平治道涂、破屋坏垣、栽种、破土”。参见允禄等著,金志文译注《欽定协纪辨方书》(中),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427页。

建立之后，官定历书中的“吉凶神宿一律删除”<sup>①</sup>，但新历书并未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旧的社会风俗习惯仍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因而，借用中国民众熟悉的内容与形式，掺入日“满”教化需求的内容，可以很快得到民众的“认可”，实现时宪书发行效果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伪满洲国时宪书的编订者视“中华民国”为“敌国”，通过将时宪书的某些内容和形式与清代时宪书“保持一致”，既有宣示伪满洲国“正统性”来源于清王朝的用意，也有与“查禁旧历，厉行国历”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对抗的目的。<sup>②</sup>

当然，在近代社会及知识转型的背景之下，伪满洲国也试图对时宪书进行改造，其中最为独特的是对历注的改造。在中国传统历书中，历注附属于年月日时之下扮演着预测人事吉凶宜忌的角色，常被视为历书最核心的内容。<sup>③</sup>而神煞吉凶所对应的“宜”与“不宜”内容，既反映了人们趋利避害的社会心理，也构筑了人们社会活动的时间秩序。但在清末民初科学知识的视野之下，历注中的吉凶宜忌被视为迷信，最终官定历书基本将之删除。不过由于历注的深远影响，特别是普通民众择吉的心理需求，使得伪满洲国时宪书最终保留了这一内容。但是传统时宪书历注中“不宜”的内容体系，对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制约，因而伪满洲国必须对其进行改造，采用了逐步减少历注中有关迷信内容的策略，从《满洲国大同三年时宪书》开始删除了“不宜”的内容，并对“宜”的内容进行了改造。<sup>④</sup>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清代时宪书所构建的神煞信仰体系，削弱了旧式时宪书“最实用”部分的功用，去掉了对社会活动的时间束缚，而“宜”的部分仍旧依照清代《钦定协纪辨方书》的“民用三十七事”从形式上加以规定，以满足民众择吉的心理需求。不过改造后的历注更加突出了“宜祭祀”和“宜沐浴扫舍宇”等内容，反映出伪满洲国一方面试图利用传统道德“训育”民众，另一方面保留符合现代科学及卫生要求的内容以厘定新俗。伪满洲国时宪书此种新旧混杂的内容特点，固然与伪满洲国时宪书编订注重迎合民众的需求有关，但从根本上讲则是由于近代知识转型和社会生产生活节奏的变化所导致的。换言之，现代工业社会的时间管理需求瓦解了传统时宪书依据农业社会生产生活节奏所构建的时间秩序。

除了以上所说的内容之外，伪满洲国时宪书还附录了诸多其他内容，其中既有社会常识，也有法令条文，还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科学知识，且不同的年份还会增删不同的内容。如《大同二年时宪书》附有《耕种养畜次序表》《权度表》《满洲国邮政各类邮件寄费表》《满洲国内电报费表》，《康德六年时宪书》添加了《学校教育概要》，《康德八年时宪书》增加了《兴农合作社概况》《普通谷类耕作次序表》《棉花栽培法》《烟草栽培法》《暂行民籍法概说》《国民储蓄会法概说》等等。此类内容有助于民众了解伪满的社会常识和农业知识，也有利于时宪书的普及。而自《康德二年时宪书》起增加的《满洲统治组织略表》，以及此后陆续添加的《农事合作社的好处》《兴农合作社所办的业务》《我国的特点与现在的地位》《协和会联合协议会是做甚么的》《国兵法浅说》《寄留法解说》《大东亚战争与铁路》《国民手账制度释义》《国民勤劳奉公制度概说》《军事援护·优遇浅说》等内容，在时宪书最后一页附录的国土之极端、各地之经纬度、主要湖泽、主要河川、全国面积及户口、主要都市人口等方面的数据，既有强化普通民众作为伪满洲国“国民”的作用，也有动员民众参与战争的功能。

<sup>①</sup> 《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1912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sup>②</sup> 丸田孝志「满州国『時憲書』と通書－伝統・民俗・象徴の再編と変容」、『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第14号、2013年3月、2頁。

<sup>③</sup> 俞晓群：《数术探秘：数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意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2页。

<sup>④</sup> 土佐原忠夫「曆書の編纂と其頒布に就て」、『暦法調査資料』第8辑、14—15页。

### 三、节假日体系的构建与演变

对节庆的阐释与控制,是古代王朝与现代国家谋求自身存在合理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构筑社会时间秩序的重要途径。不过节庆的设定不仅受制于传统习俗,也受制于现实政治运作的需要,还与自然物候变化的节律有关。而对节庆意义的阐释,不仅展现了节庆自身的流变,更表现了节庆设置者及意义解释者的意图与需要,是了解时间政治的重要线索。伪满洲国节假日体系的演变大体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从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至1936年间,这一时期伪满洲国初步构建了官方的节假日体系。第二阶段从1937年至1940年溥仪访日之前,伪满洲国节假日形成了三个层级的内容:面向全体“国民”的祝祭日体系、面向政府机构成员的官署放假日期和面向普通民众的民间重要祭祀纪念日体系。这一时期是伪满洲国节假日体系完善的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是民间祭祀纪念日体系的确立,也标志着伪满洲国节庆政治范围的扩展。第三阶段从1940年溥仪访日之后至伪满洲国灭亡,这一阶段日本强化了对伪满洲国的控制,因此日本重要的纪念日进入伪满洲国节假日体系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伪满洲国构建时间体系及政治秩序的载体,时宪书中节假日体系的内容变化既展现了编订者的意图,也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时局形势的变动,其变化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官署纪念日与民间祭祀日及节日的分野,政治纪念日地位的提升;二是时宪书中与日本有关的重要纪念日逐渐增多,并占据了主导地位。

伪满洲国建立之初,为保障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在规定正常办公时间的同时,制定了《官署放假日期表》,以确立除星期六和星期日之外的放假日期,伪满洲国的纪念日及节日体系初步形成。这些节假日主要包括部分中国传统节日及伪满洲国的重要纪念日:元旦、春节、执政万寿、建国日、祀孔(春祭)、祀关岳(春祭)、端午节、祀孔(秋祭)、祀关岳(秋祭)、中秋节、孔诞、年末、除夕。这些纪念日或节日设定了对应的阴历或阳历日期,并对节庆的内涵和纪念活动进行了重构。1932年编订的《大同二年时宪书》就已经添加了这些节日及纪念日,并将此节假日体系以“祝祭日”命名。<sup>①</sup>在此基础上,1934年的《满洲国大同三年时宪书》增加了元宵节。<sup>②</sup>1935年的《康德二年时宪书》将“执政万寿”改为“皇帝万寿”<sup>③</sup>,以适应溥仪称帝的需要。此后,伪满洲国节假日体系都是在此基础上增减的。

如果节庆体系仅仅适用于伪满洲国的政府机构,那么节庆的影响势必受到限制,因而构建面向伪满洲国全体成员的节庆体系势在必行。1935年6月,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编纂了《满洲国假节日》,其中除了说明《官署放假日期表》所规定的节日和纪念日的缘起之外,还考订了民间节日,包括寒食节、清明节、七月七日、重阳节、龙抬头、腊八、祭灶和娘娘庙会。<sup>④</sup>这一文件初步确立了伪满洲国节庆体系官民分野的状况。不过,将这一节庆体系纳入到时宪书中的是1937年的《康德四年时宪书》,其中分设《官署例假日期表》和《民间重要祭祀纪念日表》,从而使新的节庆体系覆盖了伪满洲国的所有成员。而《官署例假日期表》中增加了“访日宣诏纪念日”<sup>⑤</sup>,以纪念溥仪

① 《大同二年时宪书》,第4页。

② 《满洲国大同三年时宪书》,第4页。

③ 《康德二年时宪书》,第3页。

④ 《满洲国假节日》,第16—20页。

⑤ 《康德四年时宪书》,第4页。

1935年第一次访日。1938年《康德五年时宪书》中则分设：《庆祝日》《官署放假日期表》和《民间重要节日祀日及纪念日表》。<sup>①</sup>其中的庆祝日是伪满洲国全体成员进行庆祝的日期，包含了四项内容：元旦、万寿节、建国节、访日宣诏纪念日，因其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在时宪书中用较大的字号标注出来。由此伪满洲国构筑了不同层级的节庆体系，也呈现出新的变化：访日宣诏纪念日的设定，标志着日“满”关系进一步得到强化；而元旦地位的提升，春节等旧历节日地位的相对下降，表明了日“满”构建一体化时间秩序的现实需求。

大同元年(1932)《官署放假日期表》<sup>②</sup>

节日	放假日期
元旦	阳历一月一日、二日、三日
春节	合于阴历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之阳历日期
执政万寿	合于阴历正月初五日之阳历日期
建国日	阳历三月一日
祀孔(春祭)	合于阴历二月上丁日之阳历日期
祀关岳(春祭)	合于阴历二月上戊日之阳历日期
端午节	合于阴历五月初五之阳历日期
祀孔(秋祭)	合于阴历八月上丁日之阳历日期
祀关岳(秋祭)	合于阴历八月上戊日之阳历日期
中秋节	合于阴历八月十五日之阳历节日
孔诞	合于阴历八月二十七日之阳历日期
年末	阳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
除夕	合于阴历腊月末日之阳历日期

1940年6月22日，溥仪再次访问日本，在日本的授意之下，将“天照大神”的“神体”迎回伪满洲国，并建立建国神庙进行供奉和祭祀。9月10日，伪满洲国发布敕令，对庆祝日、祭日、节祀日和休息日进行了重订。<sup>③</sup>随后制定的《康德八年时宪书》，在《庆祝日》中增加了纪元节(阳历二月十一日)、天长节(阳历四月二十九日)和建国神庙创建纪念日(阳历七月十五日)。《官署放假日期表》中添加了“祈谷祭”(四月二十日)、“尝新祭”(十月十七日)两个祭日。<sup>④</sup>这些新增的纪念日大大强化了日本纪念日在伪满洲国纪念日体系中的地位。以建国神庙创建纪念日为例，伪满洲国直接宣布将“奉祀日本天神之天照大神为我国建国元神，崇敬日本最高之神为我满洲国之最高神，用示日满一体之至圣精神”。<sup>⑤</sup>1944年出版的《康德十二年时宪书》中将“建国神庙创建纪念日”改为“元神祭节”<sup>⑥</sup>，进一步凸显了天照大神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纪元节(神武天皇即位之日)与天长节(裕仁天皇诞日)都是日本重要的纪念日，伪满洲国时宪书将之规定为所有“国民”的重要纪念日，无疑是日本强化对伪满洲国控制的表现。特别是伪满洲国发布的《建国神庙祭祀令》，以法律

① “满洲国中央观象台”编纂：《康德五年时宪书》，“满洲国国务院”康德五年(1938)颁行，第5页。

② 《官署放假日期表》，《满洲国政府公报》第3号，大同元年四月二十五日(1932年4月25日)，第3—4页。

③ 《关于庆祝日之件》，《满洲国政府公报》第1915号，康德七年九月十日(1940年9月10日)，第1页。

④ “满洲国中央观象台”编纂：《康德八年时宪书》，“满洲国国务院”康德八年(1941)颁行，第5页。

⑤ 《国本奠定·释义》，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1辑，第8页。

⑥ 《康德十二年时宪书》，第5页。

的形式将这些重要纪念日归为“大祭”或“中祭”的行列,又通过溥仪“亲祭”等仪式的举行<sup>①</sup>,极大地提升了日本政治纪念日的地位。换言之,通过这些等级不同的纪念日及政治仪式的操演,日本强化了伪满洲国的从属地位以及“日满一体”的时间秩序。

另一方面,伪满洲国民间节庆体系的构建十分注重与民众的信仰、习俗相匹配,以期收到实效。正如《满洲国假节日》所言,政府所列的节假日,“是沿国民历来之传统,参照建国之趣旨,使国民于日常生活中吻合于王道之实践,不啻于国民之思想上及情绪上,加一番精神上的训育”。<sup>②</sup>中国传统节日在普通民众中影响深远,自然也成为日“满”教化民众的重要资源。《康德四年时宪书》的《民间重要祭祀纪念日表》就构建了一套新的节日和纪念日体系:除夕、释迦佛庙会、汤岗子娘娘庙会、植树节、天齐佛庙会、佛诞庙会、娘娘庙会、药王庙会、关帝庙会、协和会创立纪念日、日本承认“满洲国”纪念日。<sup>③</sup>《康德五年时宪书》除了延续以往民俗节庆的内容外,还添加了春秋祀关岳、佛诞庙会和孔诞等四个日期。随着伪满洲国“帝政纪念国民勤劳奉仕全国绿化运动”的推进,“植树节”无法涵盖更为广泛的政治意涵,《康德八年时宪书》将之去掉了。<sup>④</sup>从中可以看出,除了政治性色彩极强的协和会创立纪念日和日本承认“满洲国”纪念日外,其他的节日以中国传统节日和东北地方特色的庙会为多,众多的庙会之所以能进入伪满洲国民间的节假日体系中,就是因为这些庙会乃“民众信仰上之最大行事,倍[备]极隆重”。<sup>⑤</sup>尽管在伪满洲国的时宪书中,民间的节假日多以民间娱乐、祭祀为主,但因为官方政治色彩极为浓重的庆祝日也是普通民众所要遵守的纪念日体系,所以政治性的节庆内容并未因此减少。

对于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节日,伪满洲国通过赋予其不同的政治含义,从而改变节庆的内容意涵。如在旧历端午节举行表彰孝子节妇的活动,意在“移风易俗”,“发扬东方道德”,推进“王道政治”。<sup>⑥</sup>再以孔诞及祀孔的活动来看,这些传统纪念日被日“满”赋予了新的内涵,着力强化“天下大同”的理念,试图为日本侵略者张本。<sup>⑦</sup>不过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的《康德五年时宪书》将祀孔放置于《官署放假日期表》中,而将祀关岳归列到《民间重要节日祀日及纪念日表》中。<sup>⑧</sup>其中缘由恰恰是因为两者所要表达的内容不一样:伪满祭孔意在“徵明王道德治之观念,以归趋国民精神”,而祀关岳则试图构建普通民众“忠君报国”的价值取向<sup>⑨</sup>,特别是发端于晚清的“祀关岳”,已从“忠义”国家被扭曲为愚忠日“满”的工具。<sup>⑩</sup>另外,在伪满洲国构建的民间节日体系中,还有释迦佛庙

<sup>①</sup> 《建国神庙祭祀令》,《满洲国政府公报》第1866号,康德七年七月十五日(1940年7月15日),第4—5页。尽管《建国神庙祭祀令》是1940年7月15日正式颁发实行,但“大祭”“中祭”的内容则随着节庆体系的调整而进行调整,时宪书中面向所有“国民”的庆祝日即是全部列入“大祭”行列的祭祀日期。

<sup>②</sup> 《满洲国假节日》,第1页。

<sup>③</sup> 《康德四年时宪书》,第4页。

<sup>④</sup> 中国传统中就有在清明节植树的习俗,1915年北京政府于清明节设立“植树节”,倡导植树造林,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孙中山逝世的纪念日改为“植树节”,意在凸显孙中山纪念与国民党意识形态传输的作用。相关情况可参见陈蕴茜《植树节与孙中山崇拜》,《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而伪满洲国则将“植树节”设在谷雨节气当日,适应了东北气候较冷的特点,既区别于北京政府时期的“植树节”,又区别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植树节”。1939年,随着伪满洲国“勤劳奉公”运动的推进,伪满当局将之前的植树节改称“帝政纪念国民勤劳奉仕全国绿化运动”,在提倡植树造林的同时,还“期望涵养奉仕爱乡及协同精神以资建设乡土”。这些内容都是原有“植树节”所无法涵盖的,所以最终被伪满洲国时宪书删除。参见吉林省林业局林业志办公室编《伪满时期东北林业史料译编》第4集(内部资料),吉林省科技进修学院印刷部1987年印刷,第130—133页。

<sup>⑤</sup> 《满洲国假节日》,第20页。

<sup>⑥</sup> 《表彰孝子节妇》,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1辑,第123页。

<sup>⑦</sup> 朱文哲:《符号、仪式与认同:民国时期的孔子诞辰纪念》,《天府新论》2015年第4期。

<sup>⑧</sup> 《康德五年时宪书》,第3页。

<sup>⑨</sup> 《满洲国假节日》,第8—10页。

<sup>⑩</sup> 田海林、李俊领:《“忠义”符号: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岳祀典》,《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会和佛诞庙会，恰恰就是因为佛教信众众多，日满通过佛教庙会也便于实施有利于自身的宗教统制政策。由此可以看出，日“满”在构建纪念日体系的过程中，保留中国传统节日或纪念日的形式，而将原有纪念日内涵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有利于其统治的工具。<sup>①</sup>

在伪满洲国时宪书编订中，编订者还试图通过重大事件纪念，呈现伪满洲国“内政外交”的情况，其中多涉及日“满”合作，这些内容也同样具有政治纪念日的功能，且内容与节日和纪念日体系构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以“满洲国”通信社发行的《康德十年时宪书》为例，该时宪书每月选取两条与伪满洲国相关的历史大事件，放置于时宪书每页的中缝处，如“刑法新法典公布”（康德四年一月四日），“郑总理发表关于帝制实施之声明”（大同三年一月二十日），“我国加入德意防共协定”（康德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建国宣言”（大同元年三月一日），“皇帝即位，实施帝制”（康德元年三月一日），“皇帝陛下御访日启辇”（康德二年四月二日），“涣发日满一德一心之回銮训民诏书”（康德二年五月二日），“涣发国本奠定诏书”（康德七年七月十五日），“日本承认满洲国、日满议定书签字”（大同元年九月十五日）等等。<sup>②</sup> 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及纪念日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又突出了日“满”的密切关系，与较为稳定的纪念日和节日体系，共同构筑了伪满洲国对普通民众进行奴化教育的节庆体系。

#### 四、余论：“化民成俗”与“王道政治”

从清末开始，在改用阳历的风潮之下，重构作为宣示政权合法性的官定历书就成为当政者面临的紧迫问题之一。然而民国建立之后，由于中国传统历法在民间的深远影响，是“与民以便”阴阳并用，还是“弃绝旧法”改从阳历，成为历书编订者左右为难的问题。不过，伪满洲国的官定历书却主动迎合旧有的民俗习惯，意在“利之王道之治”<sup>③</sup>，并试图通过官定历书内容体系的重构以“化民成俗”，实现日“满”的时政统一，从而完成“王道政治”的目标。这一取向与民国以来的历书改制情况截然不同，也包含着极为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

伪满洲国时宪书混杂的内容体系中，旧历内容的存在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就以历书历注中的宜忌吉凶内容为例，在民国建立之后的官定历书中已经基本被去除了，但在伪满洲国的时宪书中仍被保留，成为伪满洲国教育“国民”的重要内容，因其教育宗旨就是以“道德陶冶”“国民”，而“欲以道德陶冶，舍提倡旧道德、旧礼教而外，即别无他法也”。<sup>④</sup> 所以伪满洲国时宪书看似适应民众惯性需求的举措，却包含着复杂的内容。其一，接续清代以来的历书制作传统，是伪满洲国通过时宪书构造自身存在“合理性”的历史资源；其二，迎合民众既有习惯，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废除旧历的运动，是伪满洲国获取“民众认同”的现实需求；其三，“尊礼崇儒”从而实现“王道政治”，是日本控制下伪满洲国的“立国之本”。由此可见，尽管伪满洲国时宪书从形式上保留了大量旧历的内容，迎合了民众习于旧俗的现实，但这些旧历内容经过编订者的改造，成为了塑造民众认同日“满”的素材。

① 方艳华：《试论伪满祀孔典礼的堕落与变异——兼论“王道政治”的历史命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② “满洲国中央观象台”编纂：《康德十年时宪书》，“满洲国通信社”康德九年（1942）版，第12—35页。

③ 《满洲国假节日》，第2页。

④ 《满洲国文教年鉴》，“满洲国国务院文教部”康德元年（1934）编印，第552页。

伪满洲国时宪书内容体系的构建,也经历了从初期“尊礼崇儒”到后期“惟神之道”的转变。<sup>①</sup>构建“日满一体”的时间秩序,是伪满洲国实现“日本化”的重要一步。而作为构建和扩展时间秩序的时宪书,将日本的纪元节、天长节和建国神庙创建纪念日等,设定为伪满洲国“全民性”的政治节日,并通过对“惟神之道”的阐释,实现了对节庆体系内容的改造。另外,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展,强化了伪满洲国作为日本战略基地的重要地位,因而通过影响广泛的时宪书对东北民众进行战争动员,也是促使伪满洲国时宪书内容体系“日本化”的重要方面。这些变化通过时宪书或隐或现的内容得以体现。从此角度来看,伪满洲国时宪书制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不断“异化”的过程。

更值得注意的是,自1932年就开始编订的伪满洲国时宪书,成为日本构建东亚时间秩序的文本范例,也成为其他日伪政权历书编订的摹本。譬如,1943年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编订的《成吉思汗纪元七三八年(岁次癸未)时宪书》,从《蒙古自治邦施政纲领》《蒙古自治邦地图》《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宣言》到节假日体系的构建和历日及历注的编排,体例几乎完全参照了伪满洲国时宪书。<sup>②</sup>另一方面,伪满洲国时宪书编订中借重历史资源的方式,也为其他日伪政权编订历书提供了经验。汪伪政权制作的“国民历”,从形制与内容上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历”几乎完全一致,独特之处就在于附录了《国民政府政纲》《大亚洲主义》《汪主席和平言论片段》等内容<sup>③</sup>,既凸显了汪伪政权对“中华民国正统”的继承,又构造了日汪之间的密切关系。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时宪书通过成吉思汗纪年凸显其“自治”特点。这些做法与伪满洲国借重清代时宪书传统的取向如出一辙。可见,在日本殖民同化的文化策略之下,尽管这些傀儡政权的历书从形式上各有不同,但都着眼于各自所能汲取的历史资源以强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构建与日本一体的时间秩序,最终实现“日本化”。其中,伪满洲国时宪书的“典范”作用不可忽略。

尽管日“满”赋予了时宪书极为重要的作用,伪满洲国时宪书也保留了大量清代时宪书和部分民初官定历书的内容,但在日本侵略者的主导和改造之下,这些“传统”偏离了原有的内涵,难以达到日“满”所期望的实际效果;迎合旧俗保留经过改造的神煞宜忌体系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之间,呈现出凿枘不合的“断裂”关系;另外,阴阳并立的时间体系也是伪满洲国“日本化”的障碍,因为“日伪政权的作战行动与行政管理等都按照新历执行,所以大幅度地恢复农历的时间节奏,其实并不合理”。<sup>④</sup>可见,伪满洲国时宪书制作所呈现出的多重困境,也是伪满洲国这一怪胎真实处境的反映。

〔作者朱文哲,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高莹莹)

<sup>①</sup> 智利疆曾指出,伪满“国家祭祀”的基本内容由初期的“尊礼崇儒”调整为中后期的“惟神之道”,并将其纳入日本“国家神道”体系,最终实现了伪满“国家祭祀”的日本化。参见智利疆《伪满洲国的“国家祭祀”及其日本化》,《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这一特点在伪满洲国时宪书的编订中也有呈现,特别是节庆体系的构建中表现尤为突出。

<sup>②</sup> “蒙古自治邦政府交通总局”编纂:《成吉思汗纪元七三八年(岁次癸未)时宪书》,“蒙古自治邦政府弘报局”1943年版。

<sup>③</sup> “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编历委员会编制:《中华民国三十年国民历》,“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教育部”1941年颁布,第87—96页。

<sup>④</sup> 丸田孝志:《日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时间与象征》,陈廷湘主编:《“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181页。

**The Alienation of “Trad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ime Order of the Almanacs in the Puppet Manchukuo .....** *Zhu Wenzhe*(92)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it formulated the Almanacs, trying to mold the “rationality” of its existence through this kind of influential texts. The almanacs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also ha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t not only attempted to follow the tradition of making calendar books since the Qing Dynasty, but also had to conform to the general trend of using to the Gregorian calendar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inject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assimilation idea into it and constructing the time order of “the integration of Japan and Manchukuo.” This trend of “transforming tradition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olitics of the king’s way” made the contents of the almanacs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extremely mixed: the new calendar and the old calendar coexisted, and the superstitious notes of the taboo were compatible with the mod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This kind of plural and rich contents were precisely the results of the alienation of making of the traditional calendar books.

**The Constraint of Identity: A Probe into the Police Certificate in the Enemy-occupied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45 – 1948 .....** *Yang Dong*(105)

Although the police certificate was a means of identity control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and puppet regimes during the War, the relevant concepts had been existed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before the War, eve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Kuomintang also issued the police certificate in the “bandit suppression” areas. The police certificate during the War was not the only formative certificate, and there were different form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periods. Japan’s police certificate system in the occupied areas undoubtedly brought the people nightmares. It was inevitable for the humiliated people to rise up and fight against it, and the CCP also responded by various struggling means, among which the destruction and use of the police certificate was an important way to deal with it. With the surrender of Japan, the police certificate system, which constrained the people’s freedom of identity, was finally dead.

**The Response of Dasheng Textile Company to Japan’s “Military Management”, 1938 – 1939 .....** *Zhou Zonggen*(120)**Commemoration of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and Construction of War Cognitions—Comments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n Japan and China* by Zou Can .....** *Li Bingkui*(135)**A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Memories and Explanatio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Xu Xinge*(139)**A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War towards Japan and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 *Ma Xiaojuan*(143)**Researching History with Multi-dimensions and Global Eyes—A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Regional History: Multiple Path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Tao Yamin, Yang Chunmei*(148)**A Summary of The Third High-level Forum on the Study of the Great Rear Area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 *Tang Ling, Huang Jia*(152)**General Table of Contents,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2018 .....** (157)

English abstracts translated by Du Chengjun and edited by Eric Hundman